

马克思主义农政问题研究及其中国化： 理论谱系、经验转向与时代价值

高士健, 杨立蛟

(山东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90)

摘要:马克思主义农政问题研究发轫于19世纪至今,中西方农政转型议题积累了丰富理论成果。以“农地—农业—农民—农村”为框架,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农政问题研究发展脉络及中国化进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18至19世纪欧洲农政转型的考察认为,农地集中化、农业资本化、农民无产化和城乡分离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通过深入农村调查认为土地分配不均、强租佃—强赋税的生产关系和农民阶级分化是造成中国农村总体性危机的关键,主张以土地革命破除封建土地制度和生产关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农政问题研究则从农业农村现代化背景出发,对土地制度、农业转型动力、农民阶层分化和农村发展趋势等议题做出了回应。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农政思想仍能回应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现实,应重视发掘其指导三农政策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农政问题研究;中国化;理论谱系;经验转向;时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24)06-0085-09

一、引言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议题。在农村城镇化和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以及大规模工商资本下乡,使农民与土地、农业之间的关系不断重构,农业农村面临急剧转型。如何理解新时期中国农业农村的转型过程与内在机制,需从经典理论中汲取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详细阐述了欧洲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结构性变迁,形成了农政问题研究的理论谱系。陈翰笙、毛泽东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对旧中国农村的实地调查中,从农地分配、农业生产转型、农民阶级分化和农村革命路径四个层面,论证了旧中国农村总体性危机的根源和解决之道,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农政问题研究的中国化。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代命题下,各地政府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推动了农村社会经济新转型。国内部分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视角重新审视了当代中国农政转型的动力和机制。

目前,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农政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理论谱系梳理。叶敬忠最早将农政问题引入国内,他主持翻译了多部经典著作,并对马克思主义农政问题研究的理论脉络和分析路径进行了全面梳理^[1]。二是经典著作再解读。陈航英分析了陈翰笙对旧中国农业生产关系、土地分配和农民阶级分化的主要思考,认为陈翰笙的乡村调查是马克思主义农政思想中国化的早期尝试^[2]。孟庆延总结了毛泽东在《农村调查文集》中对旧中国农村阶级关系、土地关系和革命策略的主要观点^[3]。

收稿日期:2024-07-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2&·ZD173);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3CKSJ10);山东省教育厅高等学校“青创计划”团队项目(2023RW014)

作者简介:高士健(1991—),男,山东惠民人,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杨立蛟(1974—),男,山东郓城人,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三是当代中国农政问题反思。当前,国内学界对中国农政转型的核心议题是中国农业是否出现了资本主义转型及中国小农经济命运。以严海蓉、陈义媛等为代表的农业转型学派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启发,从农民分化视角考察了农业生产和流通环节的资本化进程,认为中国农业已经出现了资本化转型,并通过实证研究呈现了中西方农政转型的差异性^{[4]49}。

既有研究仍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一是主要梳理了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农政问题研究的理论关切和核心观点,但对其从产生到引入中国过程中的传承性和差异性缺少分析;二是既有研究以经典著作再解读为主,但对马克思主义视角下中国当代农政问题研究的脉络和观点缺少系统性梳理。考茨基作为农政问题概念的提出者,他在总结马克思、恩格斯对欧洲农业资本主义转型理论观点的基础上,明确了农政问题理论的重点包括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农业生产方式、农地所有权、农民阶级分化和农村治理动员四个方面的变迁^{[5]16}。叶敬忠在对西方不同流派农政问题研究的梳理中,也沿袭考茨基的观点将农业生产方式、农地所有权形式、农民阶层分化作为论述的重点^[6]。由于城乡关系理论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对农村转型研究的核心命题,叶敬忠补充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农政问题研究者对城乡关系的论述。本文将统合既有农政问题研究框架,从农业生产方式、农地所有权形式、农民阶层分化、农村治理动员与城乡关系四个维度,对马克思主义农政问题的理论谱系、发展进程及中国化路径进行系统梳理,并通过比较中西方农业农村发展历史和现实逻辑,尝试从马克思主义农政问题研究体系中汲取中国农村发展的政策启示。

二、理论谱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农政问题研究的理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农政问题的研究以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考茨基的《土地问题》和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为代表成果,他们聚焦农业生产方式转型、农民阶级分化、农村土地分配和城乡关系发展等,在核心观点上具有传承性。本部分将梳理早期马克思主义农政问题研究的理论观点和发展路径,对其进行更为整体的考察。

(一)农地:土地所有权形式和土地革命方式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土地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对土地所有权形式与改革方式的考察。马克思考察了15~18世纪英国新兴资产阶级通过圈地运动实现土地集中的过程,及由此引发的农业资本主义转型,他认为传统小土地所有制因生产资料分散、排斥社会分工和协作,制约了农业生产力发展^{[7]872-873}。恩格斯也指出传统小土地所有制会在机器大生产时代解体,新式农业生产方式会摧毁小土地经济^{[8]368}。考茨基认为小土地所有制会受到资本主义经营挤压,但他发现农业资产阶级需要小土地所有者为其提供稳定的本土雇工,这会延续后者的生存空间^{[5]116-124}。列宁利用俄国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呈现了俄国农村土地向农业资产阶级集中的过程,认为大土地所有者在耕作技术和生产成本上都要优于小土地所有者^{[9]155-158}。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农业资产阶级的大土地所有制是农村生产力进步的条件,但同时也看到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劳动力和土地自然力的破坏^{[10]919}。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应该通过土地革命实现土地国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农业中的剥削关系^{[11]175-178}。他还指出应根据各国国情,探索差异化土地公有制形式^[12]。马克思的观点之后遭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者篡改,后者将维护中农、大农和地主土地私有的利益条款纳入到拟定的土地纲领中,并声称得到了恩格斯支持^[13]。恩格斯撰写了《法德农民问题》,对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批判,声明自己支持保留小土地所有制是为在革命初期争取更多农民参加革命,并非是保护小私有制^{[14]373-375}。考茨基则认为只有农业无产阶级与工业无产阶级的利益完全一致,无需制定特殊土地纲领进行保护,应在农业现代化基础上建立公社土地所有制^{[5]380-387}。这场关于土地问题的争论持续了二十余年,以恩格斯、考茨基的胜利而告终。列宁是马克思土地思想的践行者,他分析了俄国农奴制,认为只有通过土地革命完成对土地国有化改造,能快速消除旧土地占有形式,建立新经济基础^{[15]783}。

(二) 农业:资本主义大生产下的小农经济命运

中世纪以前,欧洲商品经济仍处于萌芽状态,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经济为主要农业生产方式^{[15]133-142}。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农业渗入,推动了农村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商品化。马克思比较了资本主义农业大生产与农户小生产的生产力差异,认为前者可以通过生产资料有效集中、合理生产分工,实现生产力提升。马克思预言随着城市工业大生产的迅速发展,家庭手工业也会被城市大工业撕断,加快小农经济解体^{[7]541-553}。考茨基也认为,资本主义大生产可以通过较高的机械化水平实现对人力、物力和畜力的节约,并以劳动分工和科学管理实现农业生产力的提升^{[5]123-124}。列宁从社会分工视角考察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前景,认为资本主义是以社会化大分工为基础形成的发达商品经济,社会分工程度不断加深,工业和农业会成为两个专业部门,工业会吸纳大量农业劳动力,导致小农生产破产,推动农业资本主义转型^{[15]164-168}。

马克思、考茨基和列宁也都指出小农经济不会快速消亡。马克思发现机器大工业取得统治地位前,资本家需要农民将原料加工到一定程度,这会促使小农经济再生^{[7]858-859}。考茨基也注意到农业的特殊性使小农经济对资本主义农场有一定补充,并不会彻底解体^{[5]133-142}。列宁则认为小农经济的存在使家庭工人无需离开农村就可以参加非农劳动,降低了劳动需求水平和雇工价格,促进了农业资本主义发展^{[9]151}。

(三) 农民:生产资料集中与农民分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英法德农村的研究中发现,随着农村商品化和工业化程度加快,小农阶级会分化为租地农场主阶级和农业无产阶级^{[16]56}。恩格斯根据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对法德农民进行了阶级划分:一是完全失去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生存的农村无产阶级;二是拥有小块土地、以家庭生产为主的小农阶级;三是经营规模较大、依靠雇工和地租剥削的富农阶级;四是采用机械化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农业资本家阶级。他认为随着金融和商业资本不断进入农村,小农阶级难以应对生产和流通风险,会逐步向无产阶级滑落。考茨基发现随着农村市场化进程加快,家庭手工业被城市工业取代,手工业与农业分离致使农民不能再通过依附封建共同体获得再生产资料,必须依赖高利贷者、商人等外部资本力量,在外部资本剥削下,农民只能出卖土地或劳动力,走向无产化^{[5]201-202}。列宁则将资本主义转型中的俄国农民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雇农(下等户);第二类是以家庭生产为主的中农(中等户);第三类是既参与生产,也剥削雇农的富农(上等户)。他看到中农群体的不稳定性,指出其会向雇农和富农分化从而导致村庄阶级矛盾,这为阶级革命提供了条件^{[9]53-66}。

阶级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注的另一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小农的阶级意识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作为私有小生产者,具有分散性、保守性和狭隘性^{[17]762};另一方面,同样遭受资本剥削的小农阶级也可以成为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同盟。考茨基对小农阶级意识的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不同,他认为除雇农外,其他农民阶级都是生产资料私有制,都与无产阶级存在利益分歧,只有无产化的雇农是革命力量^{[5]401-403}。考茨基对农民革命持悲观态度,认为农民革命性并不稳定,从观点上开始与马克思主义背离。列宁根据俄国革命现实讨论了对中农的动员策略,他认为激进地消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农会对俄国革命造成负面影响,为取得革命胜利应对其保留私有制进行暂时妥协^{[18]65}。

(四) 农村:城乡分化与城乡融合

农业生产资料高度集中与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引发的城乡关系变迁,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注的重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确立会推促城乡之间形成社会分工,城市资本对农村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占有,导致了城市剥削乡村的二元结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城乡分化打破了乡村封建主义的孤立与分散,是进步性历史进程。列宁也发现,生产资料集中导致了农民无产化以及城市工业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成为打破农村封建生产关系的重要机制^{[16]165-167}。考茨基则指出随着农业资产阶级进入城市工商业,以及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村社会经济衰败,导致城乡分化进一步深化^{[5]256-257}。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认为,城乡分化是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进步趋势。但他们也指出,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城乡一体化发展将是新社会形态下的重要议题。马克思认为工人政党取得政权后,国家作为统筹力量可以将机械与技术运用于农业大生产之中,以提升农业生产力^{[11]175-178}。恩格斯、考茨基则建议通过国家或集体土地所有制,建立以合作社为单位的集体经营制度,为农业经营提供稳定的基础设施和贷款支出^{[14]375-376,[19]210-220}。

综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城乡分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打破农村封建生产关系的历史进程。但当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通过宏观调配与农村集体经营制度构建城市支持农业、工业反哺农村的城乡融合发展路径,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欧洲城乡关系发展的判断和规划,也对当下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路径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经验转向: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农政问题研究的路径

20世纪初,旧中国农村正面临总体性危机,政学两界兴起了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争论,随之出现了解决中国农村总体危机是发展生产力还是改革农村生产关系的分歧^{[20]187}。1929年,陈翰笙组织了对无锡、保定、岭南以及山东等地的农村调查,以回应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争论。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开始了对寻乌、兴国一带农村的调查,试图从实践层面寻求农民革命道路。陈翰笙和毛泽东在调查中都关注农地分配、农业生产关系和农民阶级分化等问题,彰显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农政问题研究的传承性,他们在研究方法上都以扎实的实地调研为基础,呈现明显的经验转向。

(一)农地:集中占有与分散使用

1929年,陈翰笙在对无锡22个村庄的调查中发现,占村庄人口不到6%的地主,占有47%的耕地^{[21]155}。同时期,他对广东和保定的调查显示:广东占农村人口2%的地主,占有52%的农村耕地;保定占农村人口总数11.7%的地主和富农占有农村耕地的41.3%^{[21]153-157}。陈翰笙发现,土地集中化并没有带来资本主义式的规模经营,地主大都将耕地拆成小块分租给佃农,造成了耕地使用分散。他认为欧美各国对农地规模化经营使其可以应用农业机械和技术提升生产力,中国农地分散阻碍了土地科学化管理和生产力提升^{[21]158-159}。

同一时期,毛泽东在寻乌、兴国一带农村的调查中,也关注到旧中国农村的土地分配不均问题。他在寻乌调查中发现,占人口8%的地主和富农阶层,占有70%的土地,而占有近90%的中农贫农,仅占有30%的土地^{[22]105}。在兴国永丰一带,地主富农人数占总农户不到6%,却占有了80%的土地;中农人口占20%,却只占有15%的土地;而占人口60%的贫农,却仅占有5%的土地^{[21]199-200}。毛泽东作为革命的领袖和实践者,更多从革命动员策略方面来分析土地分配问题,他认为绝大多数中农、贫农耕地不足,对平均地权有强烈需求,解决土地分配不均只能进行土地革命。

(二)农业:强租佃—高赋税下的生产关系

土地高度集中本应使旧中国农业生产也存在向资本主义农业转型的可能,但陈翰笙看到强租佃—高赋税的生产关系阻碍了转型的到来。他对广州的调查显示,佃农占农户总数的比例在70%~90%之间,^{[21]85}这说明地主与富农占有大量耕地,但没有从事以雇工为主的经营式农场,而主要通过收租来获得收益,农业生产关系呈现强租佃特点。陈翰笙还分析了在强租佃关系下佃农遭受的残酷剥削:一方面,地主收取高额预租、押金,滋生了更夫、包税商、高利贷者等食利阶层;另一方面,政府收取过高田赋与捐税,加剧了佃农生存困境。在强租佃—高赋税的农业生产关系下,地主和富农阶层退出农业经营,农户难以承担地租和借贷利息被迫退出农耕沦为苦工和小贩,造成了农业生产力全面衰退。陈翰笙将旧中国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方间的矛盾,归结为“有可耕的土地而不耕;有可用的人力而不用”^{[21]139}。

毛泽东在寻乌的调查更为详尽地呈现了租佃制下的剥削关系及农民生存困境,他将农村剥削关系分为三种:一是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剥削,包括见面分割制和量租制;二是地主富农对农民的高利剥削,主

要包括钱利、谷利和油利;三是地方政府对农民的税捐剥削,主要包括钱粮税、印花税、屠宰税、护商捐以及临时派款借款等^{[22]136-143}。在严酷的地租剥削下,农业产出中的绝大多数被地主榨取,农民只能面临“禾头根下毛(没有)饭吃”的境地,而严酷的高利剥削直接导致了农民无产化。毛泽东发现这种以租佃地租和高利贷为主的强剥削关系,使地主无心农业生产和改进生产技术,农业生产力提升失去了动力。他写道:“他们(地主)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组织生产,完全以收租为目的。固然每个大中地主家里都多少耕了一点田,但他们的目的不在生产方法的改良和生产力的增进”^{[22]124}。

(三)农民:早期中国农民阶级分化的调查

陈翰笙是中国较早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进行农村调查的中国学者,他在对广东的调研中明确了中国农民阶层划分的特点。他提出的农民阶层划分标准如下:有能够过活的中等劳力而在雇佣关系上不剥削他人、也不被人剥削的农户,可称为中农;雇佣长工或雇佣散工而超过当地普通农户所必须的工人数量,且其所耕田亩数超过普通中农一倍或一倍以上,可称为富农;耕作亩数不及中农,还要依靠被雇佣收入过活的农户,统称为贫农;耕种极少田地,主要或完全依靠被雇佣过活的都是雇农^{[27]86}。他看到旧中国农村各阶级具有两方面转化倾向:一方面,随着地方军阀连年增加田赋,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阶级变卖土地转而从商,富农阶级也与地主一样放高利贷与经商,而不是成为经营型农场主^{[21]164-167};另一方面,中农和贫农只能以生产资料作为抵押向地主和富农贷款,极高的赋税和农业市场疲软常使其因无法偿还借贷而失去生产资料,成为无产化雇农^{[21]170-172}。阶级分化的结果是大量资本集中在城市地主和富农手中,而中农、小农缺少农业再生产所需资本,又失去了土地,不得不退出农业。

毛泽东的农村调查相较于陈翰笙有更强的阶级动员关怀。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到:“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剖析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22]5}。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将寻乌农村人口按照生计方式进行了阶级划分,主要包括:大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中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下二百石以上)、小地主(收租二百石以下)、富农(有余钱剩米放债的)、中农(够食不欠债)、贫农(不够食欠债的)、手工工人(各种工匠、船夫和脚夫)、游民(无业的)和雇工(长工和零工)^{[22]105}。他依照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对贫农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划分,包括半自耕农、生活较好的佃农(拥有生产资料)、穷佃农(少数生产资料)、赤贫佃农(无任何生产资料)。他看到大多数贫农在多重盘剥下逐渐沦为农业无产阶级,成为可以动员的重要革命力量。

(四)农村:总体性危机与革命路径

以卜凯为代表的“中国农村经济技术学派”,曾将中国农村的总体性危机归因于生产力和生产技术落后,提出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是破解农村危机的关键路径。陈翰笙、毛泽东对旧中国农村深入调研后发现中国农村危机的根源并非技术缺失,而是土地分配不均所造成的畸形生产关系。

陈翰笙指出,土地分配不均所滋生的大地主阶级通过各种租佃制度对小农的严酷剥削、地主富农的高利贷盘剥、殖民资本在生产和流通领域对小农生产的过度汲取,是造成当时农村凋敝的症结所在。因此,陈翰笙倡导,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和农业危机的关键是通过民族解放运动废除压在中国小农身上的殖民剥削和封建剥削,并通过土地改革解决农村土地分配不均问题。他非常赞同当时解放区实行的减税、减租、减息和没收汉奸土地的土地改革,并指出在土地改革后,应深化以土地私有制为主的生产合作,这可以极大提升农民劳动的积极性^[23]。

毛泽东则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土地革命思想与中国农村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通过实地调研摸清中国农村基本情况后,他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土地革命的策略和方向:先通过土地革命将封建土地所有制转化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再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确立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24]。在一系列曲折探索和实践,中国农村土地逐步形成了集体所有的小公有制形式,探索出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土地体制。随着土地所有权制度变迁,中国农政转型也开启了新续篇。

四、时代价值：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农政问题研究及启示

时至今日,土地革命瓦解了旧中国农村强租佃—强赋税的剥削关系,新中国农村在历经合作化运动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重新焕发活力。但随着中国城市工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市和工业转移,对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形成了新冲击。政府积极鼓励龙头企业下乡和培育新兴农业经营主体,助推了农地经营、农业生产和农民分化等方面的新变化。当代中国农政问题研究者开始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切入,关注中国小农在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命运,并认为中国农业转型正步入新阶段。

(一)农地:土地大规模流转与村庄秩序再造

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完成了土地均分,解决了旧中国土地分配不均的局面。在经历了短暂集体化时期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建立了“两权”分置的农地制度,即所有权归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农户。2014年,“三权”分置政策出台,将土地经营权从承包权中分离出来。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阻止了因资本下乡导致的农民与土地分离^[25]。实际上,尽管在法律上农户保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但在农业效益不高、城市务工机会充足的情况下,他们会将土地流转。官方数据显示,全国土地流转面积占承包地总面积的比例,从2006年的4.6%上升到2016年底的35.1%。^①随着国家提出农业产业化战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兴起,大规模土地流转市场形成。

孙新华对皖南河镇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农业现代化规划是土地流转的重要动因,政府动员村民将土地流转给以下乡资本和种粮大户为主的规模经营主体,形成了对小生产者的替代^[26]。焦长权、周飞舟对重庆涪陵区的调研也发现,当地有近60%的土地流转给了公司,企业获得大规模土地经营权后却无力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机会,造成了农民被动的城镇化和雇工化^[27]。由于资本下乡会在农业生产环节对小农户产生挤压,中央开始逐步限制工商资本下乡进行大规模土地流转,并鼓励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内生性主体对农业进行适度规模经营。据统计,2020年有32000万亩耕地流入农户,11500万亩耕地流入合作社,5558.54万亩耕地流入企业,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成为新规模经营主体^②。由此可见,农村土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土地商品化,但土地经营权市场化使土地仍不断向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和种植大户集中。土地经营权集中不仅改变了村庄政治社会结构,也引发了农业生产和流通关系的转型。

(二)农业:生产与流通的全面商品化

随着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出现,学界兴起了关于新时期中国农业转型的讨论,讨论焦点在于中国的小农经济是否正经历资本主义转型。以黄宗智为代表的小农经济学派认为,中国农业转型过程并没有伴随大规模雇佣劳动出现,农业中的低雇工率证明了农民家庭仍是中国农业的主体^[28]。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农政问题研究形成了不同判断,严海蓉、陈义媛修正了黄宗智以雇工农户与“全部农户”比例作为农业低雇工率的论据,认为应以雇工农户和家庭农场的比例来计算,得出雇工至少占到家庭农场劳动力的28%,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农业领域已经存在^{[4]52}。孙新华对河镇的研究发现,当地规模经营主体平均雇工率超过30%,显示了规模经营主体崛起带来的农业资本主义化趋势^[29]。

除生产领域外,流通领域资本化进程对小农经济形成了双重挤压。武广汉在对“中间商+农户”模式的研究中认为小农虽在生产环节有自主性,但在流通市场上却高度依附中间商,农户在生产环节的自主性在流通领域中丧失,导致了农民半无产化^[30]。陈义媛也看到龙头企业下乡与农户虽没有形成直接雇佣关系,但通过控制农业生产上游和下游,形成了隐蔽雇佣关系,实现了对农业剩余价值的占有^[31]。陈航

① 本数据由作者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6)》《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2016)》相关数据整理所得。

② 数据来源于土流网: <https://www.tuliu.com/data/nationalWhere.html>, 2023年11月7日引用。

英对皖南河镇的研究中则发现,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生产服务主体和收购加工主体形成了具有密集经济社会网络的利益共同体,对农民生产和生活资源全方位垄断,从根本上瓦解了小农经济^{[32]70}。

(三)农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兴起与农民阶层分化

随着农村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形成,小农经济也在发生分化。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当代农政问题研究,更多从农业生产关系层面考察了农民分化与小农经济命运问题。张谦、杜强将农民划分为自给自足式农民、商业化农业生产者、企业化农业生产者、合同式农业生产者、中国特色的半无产农村工人、半无产农场工人和无产农场工人。他们看到,随着农产品、劳动力和土地的高度商品化,自给自足式的传统小农已经消失,大多数农业生产者向商业化农业生产或企业雇佣的农业工人转化^[33]。陈义媛对平晚县家庭农场的研究中也发现,随着农业市场化进程加快,传统小农会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商品化而退出农业生产,依靠自发流转土地而形成的中农阶层在市场化进程中呈现出高度不稳定性,以家庭劳动力为主的规模化家庭农场和依靠雇工生产的企业化农场将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的主体^[34]。陈航英则看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兴起正使农业生产者分化为两个群体:一个是由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农业生产服务主体和粮食收购加工主体构成的利益共同体;另一个是不断提供土地资源和出卖劳动力的普通农户。前者依靠手中资源不断实现资本积累,而后者从属于前者,无力从中获得发展机会,愈发陷入到从属性境地中^{[32]74}。

(四)农村:资本下乡、再小农化与政策路径

随着中国城市工业高速发展以及城乡二元制度松绑,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量转移,中国农村社会经济也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言的乡村凋零。为应对农村社会经济衰退,近年来国家通过调整城乡关系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举措,推进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宏观政策,表现之一是各地政府积极招引工商资本下乡经营农业,并在农村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工商资本下乡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兴起重塑了农业生产关系,生产资料和流通市场被少数经营主体垄断,小农户在生产和流通领域被纳入到新的资本积累体系中^[35]。

但中国没有像西方一样出现农村人口城镇化和农业经营规模化的线性发展历程。中国小农家庭对土地的文化认知、乡土社会基于地缘与血缘形成的伦理惯性,构成了对农村社会经济市场化和资本化变迁的反向力量,农业经营呈现“再小农化”趋势。一方面,在农村保护型土地制度下,被城市工业淘汰的老龄农民和留守妇女将农业视为保障性生计,由此形成的“老人农业”“妇女农业”具有低成本、低风险优势,阻碍了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另一方面,乡土社会固有的“内外有别”的行动伦理,导致外来资本与乡土社会互动中存在“水土不服”问题,增加了资本下乡经营农业的难度^[36]。自2018年开始,中央一号文件给予小农户前所未有的关注,提出要“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统筹兼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户,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但也应正视正在发生的现实:土地、劳动力和农资全面商品化背景下,农业生产关系已全面转型,政府政策扶持也很难遏制小农解体。小农基于成本优势和伦理机制自发形成的对农业资本化转型的反向运动,只是延缓了农业资本化进程,并没有带来其实际权益的增加。在中国农政转型过程中,如何在政策上提升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大市场的有机结合,保障小农经营在农业转型中的增益空间,依然是中国农业转型中面临的政策议题。

五、行动与区域:马克思主义农政问题研究的展望

综上所述,早期马克思主义农政问题研究更多从欧洲的农业生产领域出发,强调欧洲农政转型的重要标志是农地所有权转移带来的农民无产化和雇佣型生产关系的形成。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农政问题研究开始关注到在封建制度和殖民势力压迫下,旧中国强租佃—高赋税的特点阻碍了农业资本主义转型,遏制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提出了应该通过土地革命来解决中国农村总体危机的构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农政问题研究则看到在“统分结合”的土地制度下,新时期中国农政转型并非依循农民无产化和农

民雇工化的欧洲农政转型路径,中国统分结合的土地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家庭生产形式,但实质上农业资本通过控制劳动资料、生产资料和农产品流通领域,实现了对小农的另类剥削,形成中国农政转型的特殊路径。马克思主义农政问题研究受到政治经济学范式影响,旨趣在于解释中西方农业农村转型中的政治经济结构。然而,任何特定研究范式的产生都有其特殊背景和旨趣,在解释具体问题时也必有其限度,马克思主义农政问题研究也不例外。在中国农业农村急剧转型的当下,要对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现实有更全面的把握,须结合多视角对其进行整体分析,这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农政问题研究提供了发展空间。

首先,应关注小农在应对农政结构转型过程中的能动策略。恰亚诺夫主义农政问题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农政问题研究对话学派,已关注到农民作为阶级性力量在应对农业资本化转型中形成的诸多日常反抗行动^[37]。在国际层面,1993年发起于比利时并随后在全球兴起的“农民之路”运动,就旨在通过农民自发性力量维护农民在生存、发展和生产层面的基本权利,可以视为是应对农业资本化转型的农民跨国运动。反观国内,大规模工商资本下乡所遭遇的农民“盗窃”问题,也证明具有社会文化属性的、抵抗农业资本化转型的农民反向运动在中国也已存在。如何将小农行动策略引入马克思主义对农业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分析,形成对农政转型“结构—行动”的整体分析,将是马克思主义农政问题研究重要的理论方向。

其次,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农政问题研究而言,应看到中国不同区域农村的高度差异性对农政转型的影响。比如从地理区位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农村依靠村集体经营完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农业已成为村办工业的附属产业,当地农业转型呈现内生性工业反向推动的过程,这与大多数中西部地区农村的农政转型过程极为不同。又如从自然条件来看,以丘陵或山林地为主的农村也与平原地区农村的农政转型存在差异,前者耕地细碎化更严重,农业规模化和机械化难度大,当地农业生产或保留了小农经营传统,或因农民进城出现撂荒,农业生产呈现发展停滞或衰退局面,而非资本主义转型。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性意味着其农政转型的不同步性和不平衡性,如何将区域视角引入马克思主义农政问题研究,考察不同区域农政转型的地方差异及其形成机理,是值得拓展的另一个研究领域。

参考文献:

- [1] 叶敬忠,吴存玉. 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农政问题与农政变迁[J]. 社会学研究,2019(2).
- [2] 陈航英. 早期中国农政研究探析——以陈瀚笙为中心[J]. 开放时代,2023(4):123-142.
- [3] 孟庆延. 理念、策略和实践:毛泽东早期农村调查的历史社会学考察[J]. 社会学研究,2018(4):1-27.
- [4] 严海蓉,陈义媛. 中国农业资本化的特征和方向: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资本化动力[J]. 开放时代,2015(5).
- [5] 考茨基. 土地问题[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55.
- [6] 叶敬忠. 农政问题:概念演进与理论发展[J]. 社会学研究,2022(1):23-45.
- [7]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9] 列宁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12] 孙连成. 马克思恩格斯论土地问题——学习札记[J]. 江西社会科学,1984(5):41-44.
- [13] 王长江. 考茨基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问题争论[J].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1986(3):41-65.
-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15] 列宁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16] 何增科.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基本观点述要[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4).
-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18] 列宁全集:第2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9] 何增科,周凡. 农业的政治经济分析[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 [20] 温乐群,黄冬娅. 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M]. 天津: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
- [21] 陈翰笙. 陈翰笙集[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23] 陈翰笙. 陈翰笙集[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08-211.
- [24] 郑以灵. 毛泽东农民观透视[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99.
- [25] 黄宗智. 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实践与理论[M].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61.
- [26] 孙新华. 强制商品化:“被流转”农户的市场化困境——基于五省六地的调查[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5):25-31.
- [27] 焦长权,周飞舟. “资本下乡”与村庄的再造[J]. 中国社会科学,2016(1):100-106.
- [28] 黄宗智. 小农户与大商业资本的不平等交易:中国现代农业的特色[J]. 开放时代,2012(3):88-99.
- [29] 孙新华. 农业规模经营主体的兴起与突破性农业转型[J]. 开放时代,2015(5):106-124.
- [30] 武广汉. “中间商+农民”模式与农民的半无产化[J]. 开放时代,2012(3):100-111.
- [31] 陈义媛. 资本下乡:农业中的隐蔽雇佣关系与资本积累[J]. 开放时代,2016(5):92-112.
- [32] 陈航英. 新型农业主体的兴起与“小农经济”处境的再思考——以皖南河镇为例[J]. 开放时代,2015(5).
- [33] 张谦,杜强. 终结的开始? ——当代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民阶层的分化[J]. 中国研究,2008(Z1)187-214.
- [34] 陈义媛. 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的兴起与农业经营主体分化的再思考——以水稻生产为例[J]. 开放时代,2013(4):137-156.
- [35] 冯小. 去小农化:国家主导发展下的农业转型[D].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2015.
- [36] 徐宗阳. 资本下乡的社会基础——基于华北地区一个公司型农场的经验研究[J]. 社会学研究,2016(5):63-87.
- [37] 詹姆斯·斯科特. 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M]. 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Marxist Research on Agrarian Questions and Its Localization in China: Theoretical Genealogy, Empirical Turn and Value of the Times

GAO Shijian, YANG Lijiao

(College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266590, China)

Abstract: Since its inception in the 19th century, Marxist research on agrarian questions has accumulated a wealth of theoretical insights into the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that have occurred in both China and the West. Taking the framework of “farmland-agriculture-farmers-rural areas”, we have reviewed the evolution of Marxist research on agrarian questions and its localization within the Chinese context. It is found that early Western Marxist researchers scrutinized the transformations in European agrarian questions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and concluded that the centralization of farmland, the capit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the proletarianization of farmers, and the sepa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were the inevitable result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Early Chinese Marxist researchers, through intensive rural investigations, attempted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e overall crisis in the rural areas in the old China, and concluded that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land, the oppressive tenancy and taxation systems, and class divisions among farmers were the primary obstacles hindering rural development. They advocated for a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to break up the feudal landholding structur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Today,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 researchers, from the background of the ongoing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n the new era, have evaluated the classical Marxist research on agrarian questions and the judgment of peasant economy on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They explore topics such as land tenure systems, the dynamics driving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the stratification of farmers,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countryside. Even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Marxist agricultural ideas continue to resonate with the realitie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efforts, and theref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discovering its value in guiding contemporary policies addressing the “Three Rural Issues”.

Key words: Marxist agrarian questions; localization in China; theoretical genealogy; empirical turn; value of the times

(责任编辑:魏 霄)